

语文写作教学论
支架式教学模式引导下的
语文写作教学研究

YUWEN XIEZUO JIAOXUE LUN

ZHILIAO JIAOXUE MOSHI YINDAO XIA DE YUWEN XIEZUO JIAOXUE YANJIU

马林莉·著

語文

语文写作教学论
支架式教学模式引导下的
语文写作教学研究

YUWEN XIEZUO JIAOXUE LUN

ZHIJIASHI JIAOXUE MOSHI YINDAO XIA DE YUWEN XIEZUO JIAOXUE YANJIU

马林莉·著

語
文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语文写作教学论：支架式教学模式引导下的语文教学
作教学研究 / 马林莉著. --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2015.12

ISBN 978 - 7 - 5534 - 9800 - 3

I. ①语… II. ①马… III. ①作文课—教学模式—教
学研究—中小学 IV. ①G633.3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06866 号

语文写作教学论——支架式教学模式引导下的语文写作教学研究

YUWEN XIEZUO JIAOXUELUN—ZHIJIASHI JIAOXUE MOSHI YINDAOXIA DE YUWEN XIEZUO JIAOXUE YANJIU

著 者：马林莉

责任编辑：矫黎晗

封面设计：韩枫工作室

出 版：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发 行：吉林出版集团社科图书有限公司

电 话：0431-86012746

印 刷：三河市佳星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710mm×1000mm 1/16

字 数：229千字

印 张：13.75

版 次：2016年4月第1版

印 次：2016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534-9800-3

定 价：63.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写在前面的话

(代序)

给人家的著作写序，的确还是第一次，总感到有点不能承受之重，因而书稿在案头搁置了一个多月，反复看了好几遍，既不能下笔，更谈不上交卷，心里惶惶不可终日。今天出版社又打来了电话，接电话的瞬间，我就意识到这活是无法推了，好在自己是教书匠出身，也搞过十多年的语文教学研究，只好勉强为之。

一九〇四年，我国的语文开始单独设科，至此，中国也就有了专门化的“语文”教育了；如今，这一专门的语文教育已经走过了一百一十一年的路程。而至新中国成立时“语文”正式定名以来，现当代语文教育也已经积累了半个多世纪的宝贵经验。在这不寻常的一个多世纪中，语文教育几经改革，日趋进步，也逐渐形成了丰富多彩而独具中国特色的语文教育思想。

近三十年，对于我国的语文教育研究来说，可谓大家辈出，有研究语文教育史的，有研究语文教学论的，也有研究语文教育规律的，还有侧重于语文教学案例分析的，这诸多的专家学者，为这个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的语文教学实践和在长期的实践中所形成的语文教育理论，成了我国教育界的一笔宝贵财富。

马林莉老师长期奋斗在语文教学第一线，积累了丰富的语文教学经验，在语文教学过程中，勇于探索，潜心研究，集众家之长，吸纳国内外教学新理念、新思维，呕心沥血，成就了这部大作。

我们知道，阅读和写作是语文教育的重要环节，肩负着培养学生语文综合素养的重要任务，历来是语文教学的重点和难点，作者通过对语文教育的各种理论进行系统的比较研究后，选择了支架式教学模式作为语文教学的理论依据。因为支架式教学模式是在建构主义理论指导下相对成熟的学习模式之一，在英语等第二语言的学习中广泛采用，具有一定的适应性。

关于支架式教学模式的定义，比较权威的是欧共体“远距离教育与训练项

目”的有关文件中提出的：“支架式教学模式应当为学习者建构对知识的理解提供一种概念框架。这种框架中的概念要根据一定的任务目标加以分解，以便于把学习者的理解逐步引向深入。”这个框架的概念是培养学生对问题的理解能力，在一步步地深化中最终完成对问题的理解。所以，该框架要依据学生的智力“最邻近发展区”来创建，通过支架的作用使学生从一个智力水平到达另一个新的更高水平，真正使教学超前发展。简单来说就是通过为学生提供一定的学习支持（这里把它比作“支架”），使学生的能力从“现有的水平”向“潜在的发展水平”发展（整个过程是循序渐进的），帮助学生建构对知识更近一步的理解。近年来，国内外的很多的专家学者都系统地研究过支架式教学模式，可以说这一模式在学术界有一定的认可度。支架式教学模式的关键在于支架的搭建，可以是教师为学生搭建支架，也可以是现有水平相对较高的同学为现有水平较低的同学搭建，或者是学生通过观察获得提示，完成自身能力的提高与知识的积累。支架式教学模式重视学生现有的知识水平和潜在的获取知识的能力，通过二者的比对来确定学生学习的最近发展区。同时，支架式教学模式重视学生的学习动机，强调自发、自愿地参与到学习活动中去。支架式教学模式强调以学生为中心，提倡自主合作的学习和对知识主动意义的建构，其引领的教学课堂是在一个基于真实事件或问题的宏观情境中进行，学生在生动的学习情境的激发下，进行自主合作的学习，他们自主发现问题，在协同合作中解决问题，在问题得到解决的同时自然生成学科的知识 and 能力。这样的教学要求教师能深入挖掘教学内容，精心地创设教学情境，课堂上紧紧围绕教学目标，既不随意发挥，又保留充足的空间去引导学生进行发现、建构、创造。支架式的教学课堂就是要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让他们在灵活多样的学习方式中找到自己的学习需要，明确学习的价值和意义，形成学科的能力和素养。可见，支架式教学模式正是目前语文教学的发展的一种诉求。

该书在系统研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得出了以下三点结论：一是客观地描述了支架式教学模式的背景及其应用现状；二是在客观描述语文教学中阅读和写作教学现状的基础之上，对其出现的问题和相关原因进行了具体分析；三是通过寻求理论指导实践的契合点，阐述了支架式教学模式是如何在引导学生阅读和写作教学中进行实践的，以期达到理论指导实践、实践丰富理论的目的。该书的中肯和精当，主要体现在全面地论述了支架式教学模式的内容，并且多维度地论述了类型、属性特点等多个方面的内容。它对于当下语文阅读教学和

写作教学均具有指导价值；然而，该书的研究还是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作者虽然已在许多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但是将支架式教学模式理论和语文教学结合的专门性研究还是略显不足。根据支架式教学模式的特点来看，它还是非常适合运用于语文教学中的，我们可以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一些拓展，以提高它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在该书的写作过程中，马林莉老师通过收集相关的文献内容，阅读大量的相关著作，找到了写作思路、理论框架，明确论题的重点和难点。并在这一基础上，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经验进行分析整理。对前期的文献资料和实践资料进行融合，总结和提炼其中有价值的部分，梳理思路，完成了这部著作的撰写工作。她在这部书上进行了艰辛而细致的工作，其中甘苦只有她自己知道，在该书出版之际，我有幸成为第一个读者，在深感受益匪浅的同时，写出了该书的第一篇读后感，权以为序，并期待作者在语文教育方面做出更加辉煌的成果，为我国的语文教育事业做出贡献。

宁文忠

乙未年春三月于合作

（宁文忠：甘肃民族师范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教授）

目 录

第一章 绪 论	1
第一节 发展历程	1
第二节 问题的提出	19
第三节 研究的理论依据	30
第二章 语文写作教学的现状调查与分析	51
第一节 现状调查（问卷调查）	51
第二节 存在的主要问题	62
第三章 语文阅读教学的现状调查与分析	66
第一节 问卷调查	66
第二节 语文阅读教学现状调查数据分析	67
第三节 存在的主要问题	77

第四章 支架式教学模式在语文写作教学中的运用	81
第一节 支架式教学模式的步骤与环节	81
第二节 支架式教学模式下的教学案例与分析	82
第五章 支架式教学模式在语文阅读教学中的运用	105
第一节 设计原则和实施过程	105
第二节 教学案例与分析	106
第六章 解决当前语文写作教学主要问题的实践策略	134
第七章 《阅读》《写作》课本教学课堂实录	153
第八章 结 语	159
附录 1	160
附录 2	161
参考文献	208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发展历程

一、中国语言文学课程发展的历史轨迹

中国古代的母语教育没有“语文”的说法，但有“诗教”“文教”之说，其含义与现代语文教育基本相近。我们这里用“诗教”和“文教”分别指称20世纪前中国古代不同阶段的母语教育活动，“诗教”和“文教”突出的特点就是“伦理性教育”。20世纪中国的母语教育学习西方的教育理论，从1904年独立设置课程“中国文学”，以后有了“国语”“国文”课程。从1950年起，改为“语文”课程。“国语”“国文”和“语文”课程的突出特点就是“知识性教育”。21世纪初，随着课程改革的深入发展，语文课程从理论到实践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形成了“发展性教育”趋势，“对话”成了语文课程的突出特点。

（一）伦理性教育：20世纪前的古代“诗教”与“文教”

“诗教”一词出自《礼记·经解》：“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诗》即《诗经》，“诗教”即语文教育，意思是说一个地方的民风如果表现出温柔敦厚的现象，是诗教涵养的结果。“文教”一词出自《尚书·禹贡》，“三百里揆文教”。“文教”即文化教育，是说礼乐文化能够移风易俗，如果一个地方实施文教，可以使方圆三百里养成文明的习俗。所以，我们这里用“诗教”和“文教”分别指称古代不同阶段的母语教育活动，“诗教”和“文教”突出的特点就是“伦理性教育”。

（二）“诗教”课程的性质、特征与教育功能

1. “诗教”课程的性质

从先秦百家争鸣到唐宋古文运动前这一阶段的母语教育活动，可以称之为诗教课程。诗教课程是以孔孟儒学的育人标准，以《诗》的审美趣味，净化、美化学习者的品德情操与历练、涵养学习者的言语行为的母语教育实践过程。诗教的终极目标是培养“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文质彬彬”的君子；它的逻辑起点是学习者通过学《诗》以陶冶情操并不断提升言语能力。以和谐为中心，在自求、自省、自克、自成中涵养美丽人生，是诗教课程核心理念。

孔子是最早确立诗教性质的人，他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思无邪”，是心灵净化、美化一种至境；前文提及的“温柔敦厚”，则是个体情感行为表现出来的一种倾向水平。《乐记》中说：“故听其《雅》《颂》之声，志意得广焉；执其干戚（盾牌、斧子），习其俯仰屈伸，容貌得庄焉；行其缀兆（舞蹈队列），要其节奏，行列得正焉，进退得齐焉。故乐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纪，人情之所不能免也。”在这段精彩的描写中，诗、舞、乐三者浑然一体，中和有节，这是对诗教标准形象的准确展现。所以说，思无邪就是和谐自然，温柔敦厚就是个体的社会情操、心理情绪与行为方式的“中和之美”。孔子十分推崇学诗，并且认为学诗的最终目的是涵养德行以实施仁政。他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他认为，如果一个人熟读了“诗三百”，交给他政治任务，却办不通；叫他出使别国，却又不能独立地谈判应对。这样，读得多又有什么用处呢？可见，儒家推崇诗教的宗旨是为了净化、美化人的心灵，并使人获得一定的能力，为全面实行仁政做准备。

孟子和荀子等人是诗教的积极实践者。孟子说：“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孟子·万章上》）他认为，讲诗不能拘泥于文字而误解诗句，不能因诗句而妨害对作者本意的理解，应该用自己的体会去推测作者的用意，这样才能得到诗的本旨。荀子说：“圣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礼》《乐》之道归是矣。《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荀子·儒效篇》）他认为，圣人就是“道”的总汇，天下“道”的总汇就在这里，历代君王的“道”也都在这里。所以，《诗》《书》《礼》《乐》的“道”都归集在这里。荀子说《诗》只言圣人之志，不但提高了《诗》的地位，

而且突出了诗教的权威意义。荀子在《诗》学方面有很大的影响，是汉人六学的开山祖师，四家《诗》除《齐诗》外都有他的传授。由于孟子、荀子等大家的讲《诗》，也由于当时“或引诗以证事，或引事以明诗”已成为一种儒雅风尚，所以，《诗》因人们的讽诵而流传很广。《汉书·艺文志》云：“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

2. 诗教课程的特征：言志、缘情、美言

言志即表达道德志向，缘情即抒发个人情感，美言即美化语言形式。《尚书·尧典》说：“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郑玄注释说：“诗所以言人之志意也。永，长也，歌又所以长言诗之意。声之曲折又长言而为之。声中律乃为和。”“诗言志”“中和为美”便成了儒家学派涵养人格的美学标准。《左传》说：“《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这里强调了志与言之间的关系，已注意到优美的语言对于诗的重要作用。西晋陆机在其《文赋》中提出了“诗缘情而绮靡”的观点，从而在“诗言志”的基础上，从情感与语言两个方面，揭示了诗教的本质特征。《文赋》还说：“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是说学习者在写作前的准备阶段，长久地伫立于天地间深刻观察，在古代典籍中任意志与情感，潜移默化中受到熏陶。这里“情志”并举，把学习者的心灵情感与古代典籍融合为一体，显示出了它的创新意义。诗教由强调道德文章，发展为强调情感文章与语言文章，把人的主体地位突出了，把诗的抒情性、文采性和道德性相提并论。从此，诗教发展成了完美的诗教，片面的伦理说教相对地被淡化，而诗的抒情性及其语言的优美性与“诗言志”一起成为诗教的特征。言志、缘情、美言这些诗教特征的发展与完善，对我国文学的繁荣，对传统母语教育的发展，对民族人格的健全，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3. 诗教课程的实践过程与教育功能：兴、观、群、怨

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孔子提出的“兴、观、群、怨”说不但指出了学《诗》用《诗》的过程，同时明确了诗教课程的功能。这一学说对后世的母语教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兴”即赋、比、兴，指《诗》的表现手法。南宋朱熹说：“赋则直陈其事，比则取物为比，兴者托物兴辞。”（朱熹《楚辞集注·离骚序》）赋、比、兴作为诗的表现手法，或直接叙事、抒发胸臆，或托物言志、比喻象征，或言它引类、启发铺排。作为诗教的功能，目的是通过一种情境培养联想力、提高表现力。

“观”即指通过学《诗》、采《诗》以提高观察力和认识能力。古代从《论语》开始，著述引《诗》是极普遍的现象。引《诗》涉及的范围很广泛，“上推天人性理”，“下究万物情状”，以至“古今得失之林”，几乎包罗万象。古籍中经常引《诗》来讲述历史、明确制度、记录风俗、议论学养、点评政治，可见《诗》的影响之广。所以，学《诗》可以提高认识力，加深对社会方方面面的了解。

“群”即指通过学《诗》、用《诗》以锻炼合群性，涵养与上下左右和睦相处的能力。孟子说：“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上）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孟子·万章下》）这是说一个人不但要和天下的优秀人物交朋友，还要通过诵诗读书和古人交朋友。随着时代的发展，诗教的内容由《诗经》而推广为所有的诗歌，“群”的含义也随之发生变化。

“怨”即指借诗以表达讽刺的方法。诗教所指的“怨”，是为了突出“诗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的作用，意在引导人哀怨要适中。诗可以怨，就是说表达的哀乐之情要适中，表达的方式也要适中，目的是通过学《诗》来涵养与人交际的能力、态度与方法。

从现代教育的角度看，“兴”指的是创设情境，它是双向的，既指学习者通过《诗》的表现手法，创设适合于自己表情达意的情境；又指学习者通过《诗》的表现手法进入文本的情境，寻找与诗情共鸣的途径。“观”指的是观察体认，也是双向的，既要求学习者借《诗》的形式去表现生活，反映社会；也要求学习者通过学《诗》去意会文本的主旨，体认观察事物的方式。“群”指的是群体交流，孔子认为学《诗》的目的是为了“授之以政”“使于四方”，所以必须在各种各样的群体场合借《诗》对话，借《诗》交流，历练涵养学习者为政的能力。“怨”指的是得体表达，即通过学《诗》以获取得体地表情达意的能力与方式。可以看出，“兴、观、群、怨”揭示了诗教的基本过程：创设情境—观察体认—群体交流—得体表达。这一学习过程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十分进步的教育教学价值。因为学习过程是实现教育功能的前提，有了这样的诗教过程，自然就会实现“兴、观、群、怨”的诗教功能。

（三）“文教”课程的性质、特征与教育功能

1. “文教”课程的性质

文教课程主要是指从唐宋“古文运动”到清朝末期一千多年的语文教育活

动。文教课程是以唐宋儒学的育人标准，以唐宋古文的审美趣味，净化、美化品德情操，历练、涵养言语行为的语文教育实践过程。文教的终极目标是培养“进不为喜、退不为惧”（欧阳修《记旧本韩文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岳阳楼记》）的文化人格；它的逻辑起点是通过学习古文以形成文道统一、文从字顺的文风，涵养具有忧患意识、旷达个性的文化人。以教师为中心，传道、受业、解惑是文教课程核心理念。

“文教”一词首见于《尚书·禹贡》中的“三百里揆文教”。是说要依照礼乐法度来化民成俗，也就是说通过文化教育来提高社会的文明程度。文教的创造性建树，就是将“文以载道”说发展成了影响我国一千多年的新的文化传统和教育传统。

唐宋时期，中国文坛自先秦两汉后又出现了一批散文大家，“唐宋八大家”便是其中的代表。这些散文大师提倡的“古文运动”及其杰出的散文作品使传统的诗教发生了开放性的变革。“文以载道”不仅发展成了一种社会思潮、文学思潮，而且发展成了一种教育思潮。在“文以载道”理论的影响下，诗教终于发展成了“文教”——朱自清先生评价说：“这时代在散文的长足的发展下，北宋以来的‘文以载道’说渐渐发生了广大的影响，可以说成功了‘文教’，虽然并没有用这个名字。于是乎六经都成了‘载道’之文——这里所谓‘文’包括诗——于是乎‘文以载道’说不但代替了诗教，而且代替了六艺之教。”

2. 文教课程的特征：切世、创意、简言

切世是指学子学文要为现实生活服务，对国家兴亡负责。韩愈在《原道》中说：“夫所谓先王之教者，何也？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之谓道（从这里到达仁义的境界就叫作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其文：《诗》《书》《易》《春秋》；其法：礼、乐、刑、政；其民：士、农、工、贾……以之为人，则爱而公；以之为心，则和而平；以之为天下国家，无所处而不当。”韩愈把孟子的“仁义礼智”发展成了“仁义道德”，他认为“先王之教”实际上就是道、文、法、民等构成的社会文化系统所产生的整体教化功能。欧阳修在《答李诩第二书》中说：“六经之所载，皆人事之切于世者。”欧阳修在“古文运动”中高扬为文必须“切世”的主旋律，反对文士“弃百事不关于心”，反对那种“舍近取远，务高言而鲜事实”的文章。

创意是指学子为文立意表达要有所创新，反对模拟和抄袭的不良风气。韩愈在《南阳樊绍述墓志铭》中说：“惟古于词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韩愈

提倡学习一定要追求创新，词必己出，反对剽窃。他在《送高闲上人序》中，将张旭和高闲的书法进行比较，“张旭善草书……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故旭之书，变动如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终其身，而名后世。今闲之于草书，有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其迹，未见其能旭也”。他借书法来阐释学习的两种境界：学习的至境在于自己对天地事物、人情世态的创造性理解和表现；一味地模仿因袭别人，既不能理解他人，也不能超越自己。欧阳修在《题青州山斋》中说：“吾常喜诵常建诗云：‘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欲效其语作一联，久不可得，乃知造意者为难工也。”他认为模仿形式容易，要创新是不容易的。

简言是指学子为文，用语要凝练，寓意要深远。唐代韩愈、柳宗元领导的古文运动，旨在反对骈文，提倡古代散文。韩愈主张学古文应“师其意不师其辞”“文从字顺各识职”“唯陈言之务去”。柳宗元认为，“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烺烺，务采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欧阳修在《论尹师鲁墓志》中提倡“文简而意深”的文风。苏轼对欧阳修文章的评论是：“其言简而明，信而通，引物连类，折之与至理，以服人心。”（《居士集序》）由于自唐宋以来众多古文大师的理论建树和实践经验，文简意深、文从字顺、务去陈言等观点成了传统语文教育必须遵循的标准。

3. 文教课程的教师角色与教育功能：传道、授业、解惑

韩愈在《师说》中说：“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其中解惑是前提，授业是手段，传道是目的。韩愈认为，教师的职责就是通过解惑授业而使学生成为具有仁义道德的人。

传道是指文以载道。韩愈在《师说》中说：“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他在《原道》中说：“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欧阳修也说，“我所为文，必以道具”。可见，高扬儒家古道成了古代语文教育的主要功能。

授业是指传授学业。韩愈说：“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他恢复并发展了三代两汉散文的传统，把散文的实用功能扩大了，在日常生活中找到了表现自己的说理、叙事、抒情、写景的广阔

天地。从文教的角度讲，对古代儒家思想的继承、对古文要义的理解、对社会生活的关注、对文章题材的突破、对文体和语言的创新、对文化人格的培养形成了授业的整体系统。

解惑是指解释疑惑。韩愈在《师说》中说：“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他认为，解惑必须从师学习，解惑的过程就是改变自我、发展自我的过程。他同时指出：“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可见，解惑是有境界的，有解决文字之惑的实用境界与解决做人之惑的理想境界的区别。

二、知识性教育：20 世纪的语文学科教育

（一）新中国成立前的国语、国文课程

1. 国语、国文课程的性质

清朝末年“癸卯学制”规定“中国文学”独立设置课程，我国母语教育从此有了自己的课程名称，标志着母语教育脱胎几千年的伦理教育，开始了知识教育的现代化时期。1904 年国文独立设置课程到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阶段是国语、国文课程的发展时期。国语、国文课程是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学夷制夷”的教育思想为宗旨，借鉴国外的学制、课程设置与教学策略，以语体散文为主要课程资源形式，历练变革学习者的言语行为，培养科学与民主型人才的教育实践活动。以知识为中心，促进由文言文向语体文的言语学习范式转型，养成科学的思维方式，是国语、国文课程的核心理念。

这一时期，战争频繁、时局动荡、内忧外患使人们认识到，传统的伦理道德教育和科举考试是麻醉国人的精神鸦片，要抵抗外族列强的入侵，必须学习先进的文化科学技术。于是，就有了国文课程的独立，就有了国语课程的诞生。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民主科学思想影响到社会的各个领域，促进了这一时期教育的改革与发展。1920 年 1 月，全国小学一、二年级国文改为语体文。《国民学校令施行细则》规定初等小学四年间全用语体文教科书，定课

程名称为“国语”，并规定到1922年止，停止使用一切文言文教科书。新文化运动中出现的优秀白话文作品，为国语课程的实施提供了资源保障。

1923年的《小学国语课程纲要》指出：练习运用通常的语言文字，并涵养感情、德性，启发想象、思想，引起读书趣味，建立进修高深文字的良好基础，养成能达己意的发表能力。《初级中学国语课程纲要》指出：使学生有自由发展思想的能力，使学生能看平易的古书，使学生发生研究中国文学的兴趣。《高级中学公共必修的国语课程纲要》指出：培养欣赏中国文学名著的能力，增加使用古书的能力，继续发展语体文的技术，继续练习用文言写作。《高级中学必修的特设国文课程纲要》包括文字学引论、中国文学史引论两部分。

在这一阶段，我国母语课程已经凸显出自己的本体特性，不但有了自己的“国语”“国文”名称，而且在尽力地从封建伦理教育中脱胎出来，试图以一种全新的面貌自立于课程之林。

2. 国语、国文课程的特征

(1) 大众化。以鲜活的民众的口头语言为母语课程的学习、交流和表达的语言，以优秀的白话文作品为母语课程的主要内容，这就是国语、国文课程的大众化特征。“大众化”是对“贵族化”传统教育的叛逆，是为“半死”的文言注入了生命力；使需要经过“翻译”的课程实践变成了可以直接“对话”的课程实践，使民主自由的思想进入了国民大众的话语系统。有人评价说，这是中国课程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一点都不为过。

(2) 实用化。把阅读、说话、作文、写字列为母语课程的主要目标，把记叙（描写）、抒情、说明、议论、应用等作为学生应当了解的文体和应当掌握的能力，这就是国语、国文课程的实用化特征。“实用化”是对“伦理化”传统教育的超越，是对母语课程逻辑起点的规律性揭示，也为后来语文课程的工具性特征奠定了基础。

(3) 科学化。在母语课程中特设文字学、文学史板块，引进语法学、修辞学、文章学、注音字母和标点符号等新式内容，这就是国语、国文课程的科学化特征。“科学化”是对“感觉化”传统教育的扬弃，是对母语课程走向规范化、标准化、国际化的有益尝试。

(4) 个性化。提倡学生涵养自由发展思想的能力，涵养读书兴趣，通过专题研究以发展文学素养和言语风格，这就是国语、国文课程的个性化特征。

“个性化”是对“八股化”传统教育的革命，是课程改革的生命力所在，也是人类教育发展历程中永恒的理想追求。

3. 国语、国文课程的教育功能

(1) 养成科学头脑。传统教育是一种典型的伦理道德教育，社会在不断地发展，科学技术在日新月异地发展，而“文以载道”千百年来依然故我。“文”还是半死的文言，“道”还是封建道德，教育一直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国语、国文课程把国际国内的一些科学研究成果、科学思维方式、科学研究方法引进学生和教师的视野，目的在于引导学生学会思考，懂得科学，走出传统封建“玄学”的怪圈，用科学的头脑去发现知识，创造新的自我和新的社会。

(2) 获得发展能力。传统教育是通过科举考试来选拔人才，一般只关注考试的结果，而不重视学习的过程。这种现象对以后学校教育的影响最严重，就是教师和学生过于看重考试分数，淡化了平时对能力的培养。国语、国文课程把和学生的生存发展紧密相关的大众语言、科学知识、实用能力纳入学习目标、学习过程和学习评价，为学生学会学习，获得生存发展能力，提供了一种条件，一种希望。

(3) 提倡艺术兴趣。传统教育的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注重艺术审美趣味的涵养。这个优点被国语、国文课程继承了下来，无论是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还是教学过程，注重欣赏书法的艺术趣味，注重体验文学的审美意境，注重推敲语言的修辞魅力，注重发现文本的多元意蕴，注重诗化学子的行为情操。继承传统教育的优秀成果，引导学生学会审美，提高欣赏能力和艺术品位，应该是母语课程改革矢志不渝的追求。

(二) 新中国成立后语文学科教育的特点

新中国成立以后，不再使用国语、国文的课程名称，全国统一改称“语文”。语文学科突出了政治思想教育的内容，教学理念与教学内容基本上与国语、国文课程大同小异，体现了语文学科以知识教育为中心的特点。1955年《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规定：“小学语文科是以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儿童的强有力的工具。”粉碎“四人帮”以后，1978年《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试行草案》还规定：“语文教学必须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完整地准确地贯彻毛主席的思想体系，重视从小培养学生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同年的《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试行草案》规定：“语文课的思想性政治性很强，历来都是为一定阶级的政